

在研战谋战的道路上

——感受陆军指挥学院为战育人文化传统的时代活力

■杨振 熊东旭



在陆军指挥学院“风采人物”颁奖典礼上,16位在本职岗位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教授受到表彰。这一活动是该院注重传承红色基因、发挥特色文化育人功能的一个缩影。 胡洪平摄

分校经过多次建制变迁,更名为华东军政大学。成员来自四面八方,想法各不相同,用什么指导方针统筹工作、凝聚人心,成为摆在时任校长张云逸面前的首要问题。

在“一切为了战争,一切为了前线,一切为了胜利”的办学方针下,华东军政大学在短时期内就步入了正规的教育训练轨道。

现在,在大店镇的那面厚泥墙上,“三个一切”的标语依旧清晰可见。此方针在陆军指挥学院研战谋战的道路上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,成为他们办育人的重要理念。

全军第一次一体化训练研讨,全军第一场依托院校组织的陆军合成旅指挥对抗演练,全军第一次组建“院校蓝军”,全军第一次作战指挥教学模式改革研讨……众多“第一次”,记录着该院在研战谋战道路上的坚实足迹。

每年朱日和演训场,总有一批陆指教员如期而至。他们在这里“集体备课”,采集第一手数据信息,打通课堂到演训场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“跨越”“砺剑”“使命”,一场场重大演训活动,青铜峡、确山、三界,一个个实兵演训场,都留下了该院教员们的身影。“战场需要什么就教什么,部队需要什么就研什么,早已成为我们教员的习惯。只有不断去部队接地气,在讲台上才能有底气。”该院训练管理系主任王吉山说。

面对人才培养新需求,教学如何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?去年,一场以合成旅(营)作战指挥专业课程重构为牵引的教学改革,在该院全面展开——数个跨学科专业教学团队,主动邀请部队旅营主管联合展开攻关,战术教研室主任黄宏强带领战术课程团队,上高原、走边关、进班排,把教学改革的触角伸到一线……最终,他们编印陆军合成旅(营)战术统编教材下发部队,梳理形成60余个专题教学设计,得到陆军首长机关高度肯定。

漫步校园,在该院作战指挥大楼西侧,“从这里走向战场”的巨型石刻引人注目。它时刻提醒着学院官兵,要瞭望战争、紧盯战场、为战育人。

三

去年年底,原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院长齐正钧迎来了一批拜访者——陆军指挥学院文化建设工作小组。他们希望从这位97岁的耄耋老人身上,进一步感悟学院前辈向战谋战的光荣传统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齐正钧的推动下,一场“未来战场设计”的大讨论在全校掀起。“那年,我们编写的《战术学概论》,推动了军事理论研究和学术研讨,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。”提起当年,齐老掩不住激动与自豪。

唯创新者胜,唯创新者强。这种在攻坚克难、开拓进取中形成的创新文化,为推动学院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走进该院,我们真切体会到敢为人先、能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结出的累累硕果:以新时代陆军作战力量运用问题为重点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,以名师领衔、中青年人才为骨干、青年人才为后备、创新团队为支撑的人才方阵初步形成,以构设集团军、合成旅综合演训环境为重点的演训中心正式运行……

四

南京东郊孝陵卫,自古就是营盘。1952年秋天,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凯旋的宋时轮,调任到此。他接到的新任务,是筹建总高级步兵学校。

“干在孝陵卫,死葬紫金山!”这是宋校长对军事教育事业的斩钉截铁的承诺。在他的带领下,全校上下以“革命加拼命”的精神和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闯劲投入到教研工作中。在历时

7年的办学实践中,“总高”为军队培养了6000多名优秀人才,许多人后来成长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级领导和重要骨干。

“为事业献身”,从老校长彭雪枫、宋时轮开始,便成为该校一代代教育者不变的精神追求。2018年,在“陆指风采人物”评选座谈会上,作战指挥系教授陈晗来讲起一件往事,让大家心生感慨:“刚到学院,我就发现黄培义教授在一辆破旧自行车前面装了一个小路灯。一问才知道,他每天加班到很晚,学校里的路灯都关了,他就靠这个车灯照亮回家的路。”

“陆指风采人物”评选是该院80周年院庆的重头戏,包括黄培义在内的16位享誉全军的专家教授当选。他们是1978年学院恢复重建以来,在合同战术、作战指挥、政治工作等学科领域的创立者和带头人,都以“三尺讲台守护者”的形象矗立在学员心中。

牺牲奉献的精神品质,在学院官兵干事创业的担当中格外夺目。前段时间,一场典型事迹报告会,让该院官兵思想受到震撼与洗礼。曹建浪是学院原军事理论教研室教员,在身患“帕金森综合征”后,他让家人把自己的胳膊捆在椅子上,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了《淮海战役记事》等著作。在该院“雪枫英坛”上,他身残志坚、忠于国防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,为年轻官兵树立了榜样,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忠诚担当的力量。该院领导感慨地说:“对当代军事教育者来说,弘扬牺牲奉献的文化传统,就是始终保持对军事教育的高度热爱、对人才培养的激情投入、对名利得失的淡然淡泊。”

浸润在几代学院师生血脉中的文化传承,造就了多年来学院人才辈出、成果迭出的动人景象,也将引领和激励着学院官兵在新时代强军强征程上奋楫前行。

渡口涛声

■点金

这句话,为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今天,在渡口旧址处,一座东渡黄河纪念碑高高矗立。纪念碑高27米,象征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东渡黄河时的1948年,整整27年浴血奋战的历史。一座占地100多亩的纪念馆也已建成,成为陕北一个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两岸之间,高原丘陵沟壑耸峙,一条大河奔流不息。不远处,一座跨河大桥连接起黄河两岸。一条新修建的沿河观光公路,使人们前来接受红色传统教育更加便捷。

在毛主席东渡黄河纪念馆入口处,有一座纪念雕塑,生动再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东渡黄河的场景。雕塑中,毛泽东伫立在船头,目光坚定地眺望着远方。“东渡号”纪念船破浪前行,寓意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渡向另一个胜利。警卫员和船工也都精神抖擞,彰显出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。

开始东渡了!历史在这里凝聚,波涛仿佛翻卷着岁月。大约二十分钟后,渡船到达了黄河对岸——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高家塔村的一处滩头。

凝视着河对岸,毛主席深情地说,陕北是个好地方。

驻足于主雕塑周围的16块铸铜浮雕前仔细阅读,对我来说,是一次历史熏陶和精神洗礼。这些浮雕集中塑造展示了党中央在陕北13年间的运筹帷幄和丰功伟绩,其中既有指挥革命战争的历史场景,也有转战陕北的难忘历程,还有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的动人画面。

在渡口看黄河奔流,我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,思绪也随之奔涌。黄河水之沉稳而迅疾地向下游流淌,终于在吴堡丁家湾上村河段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,形成了天下黄河第二碛,水流湍急,风起云涌,涛声如雷。

再往下游流淌,就有了壶口瀑布,把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磅礴气势演绎到极致。

在壶口,再去回味吴堡县川口村红渡口的涛声,就会发现那涛声中充满了平静的韵味。正如毛主席东渡黄河,将中国革命在悄然间,渡向了一个新的起点……

硝烟中的灯火

1938年秋天,党中央决定成立电影团,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。电影团设在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头的窑洞里。大家想方设法,因地制宜,精心布置,居然并井有条地布置起一个手工方式制作影片的工场,把几孔窑洞变成了一座“窑洞电影厂”。这样的电影制片厂,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延安没有电,夜晚大家只能点个小煤油灯照明。在这种情况下制作电影,没有别的办法,我们只能从太阳光上打主意,拍摄字幕、动画、印放照片等,都是利用照射到窑洞前的阳光来进行。在室内拍影片,只能利用从窗外照射进来的亮光,把光圈全打开,甚至降低摄影机的频率,拍一个镜头煞费苦心。“七大”的材料就是这样拍的。阳光不像灯光,它不由人支配,我们稍有延误就会丧失拍摄时机。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,就因为当时屋里没阳光,没能记录下来,大家都感到遗憾可惜。

延安当时没有自来水,水源只有一条延河,和一些打在山脚下的水井。冲洗影片和照片要用大量的水,我们只好用人工从延河里、从深井里提上来水,一担一担地挑到山上去。遇到下雨,山路泥泞,坡陡路滑,寸步难行,洗一次片子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。当时正值根据地困难时期,胶片来源断绝,只有之前拍摄《延安与八路军》剩下的一点,大家必须精打细算地省着用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电影团在延安制作了《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》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》《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》《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》《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》《延安各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攻胜利大会》《秧歌运动》《国际青年节大会》等纪录片。这些影片已成为重要史料,随着时间的推移,愈发显出珍贵价值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1942年我们拍摄了大型纪录片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》(又名《南泥湾》)。这是电影团在延安摄制完成并普遍放映的唯一影片。在当极端困难的条件下,能把它摄制成功,很不容易。

1941年后,日寇调集重兵对根据地实行残酷“扫荡”。同时,国民党顽固派用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,不断制造反共摩擦。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,自力更生,实现生产自救。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司令员的带领下,响应号召,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区,进行屯垦生产。他们披荆斩棘,把荒山僻野开发成万顷良田,使满目荒凉的黄土高原变成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。

这部影片由吴印咸主持拍摄,徐冰协助,我是影片的剪辑编辑。印咸在拍摄影片之前,刚刚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。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,给了他很大的启示,使他进一步理解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斗争中接近工农兵群众的道理。他决心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,贯彻座谈会上制定的革命文艺方向。于是,他深入部队,从早到晚跟随战士们在劳动现场一起生活,满怀激情地拍下一个个动人的镜头。

我们在拍摄中遇到的困难很多。首先是没有适用的电影底片。当时电影团仅有几尺过期的16毫米正片。能不能把这批正片当底片用?从胶片性能上说,是不可能的。但是除此之外,没有别的办法。正片与负片,两者差异很大,效果不好是意料中的。但是印咸运用他丰富的摄影经验,摸索出这批正片的感光特性,在曝光技术上下了大功夫。经过他的努力,影片拍出的效果比预料的要好得多,实在是难能可贵。

冲洗底片时,底片长度有几千尺,可是我们每次只能洗20尺。这就要把全部底片分割成几百个小卷分别冲洗,同时洗出的全部底片还要保持色调一致。16毫米片的画幅很小,又没有编辑机,连放大镜也没有,我剪辑时便只能使用一面镜子,将光折射到影片上,透视出画面内容,再选择镜头,确定剪接点。这需要我准确地看清画面上的细微动作,煞费眼力。

影片拍完后,印咸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请求,要他为影片题字。毛泽东同志愉快地接受了,挥笔写了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。印咸把毛泽东同志题字的神采,用摄影机拍摄下来。我把这组难得的镜头作为序幕加在影片的开头,对全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这部影片的摄影很有艺术特色。虽然片中许多场面都是表现紧张繁重

窑洞电影厂

■钱筱璋

的体力劳动,但印咸却拍得富有诗情画意。他把战士们在艰苦劳动中那种愉快奋发的精神面貌,表现得淋漓尽致,给人以明朗乐观的感受。影片构图相当精美,在抒情的格调中洋溢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和劳动的美,显示了印咸在摄影上的高超水平。

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,影片不能配上音乐和解说,就是部无声电影,艺术上会逊色不少。大家很不甘心,于是开动脑筋,想办法要把它搞成有声电影。大家从电讯部门借来扩音器,从曲艺借来留声机,并请曲艺老师帮忙选了一些适合画面情绪的音乐唱片。在影片放映的同时,我们就在银幕后面用手摇马达带动扩音器,用小喇叭当话筒,把音乐和现场解说播送到全场,画面与音乐、解说配合得十分和谐,成功地映成了“有声电影”。

1943年2月5日,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报道了《南泥湾》影片制成上映的消息,引起边区各界的关注。在党中央大礼堂首映的那个晚上,影片放完后,观众热烈鼓掌后散去,周恩来同志没有走。他走到银幕后面,亲切地询问我们是如何配音的,并热情赞扬这个土法“有声电影”。

从领导到群众,这样热情地赞赏这部影片不是偶然的。因为它所反映的内容与当时的革命斗争是紧密结合的,与群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。尤其是在部队广泛放映时,它特别受战士们喜爱。战士们看到自己上了银幕,成了银幕歌咏的主角,都感到非常激动。毛泽东同志在《组织起来》中曾说过:“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、新四军,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、会做群众工作,又会生产,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,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,‘无敌于天下’”。他的这些话,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部影片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。

(整理自钱筱璋回忆文章,有删减,原文刊于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·抗日战争时期》)

作者简介:钱筱璋,电影编导,安徽芜湖人,1918年出生。抗战爆发后,与袁牧之等人在武汉拍摄抗战电影。1942年加入延安电影团。曾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新闻组组长、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,代表作有纪录片《抗战特辑》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》(又名《南泥湾》)《民主东北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百万雄师下江南》等,被誉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。



观看纪录片《南泥湾》
扫描二维码



长征

第5034期